

清代江南地区学术研究兴盛与私家藏书发达之关系初探

陈东辉*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本文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清代江南地区学术发展与私家藏书之间的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互动关系。前半部分论述了清代江南地区学术尤其是朴学的昌盛, 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兴旺; 后半部分论述了私家藏书之兴盛, 反过来又促进了清代江南地区学术尤其是朴学的发展。

关键词: 私家藏书; 清代学术; 江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 (2004) 04-0012-04

在中国历史上, 从总体而言, 江南地区堪称私家藏书最为兴盛的区域, 清代尤其如此,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均属规模空前, 在全国首屈一指。笔者认为, 清代江南地区私家藏书之所以如此发达, 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学术发展应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并且清代江南地区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存在着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互动关系。众所周知, 清代系中国学术史上集大成的重要时期, 一大批学者在众多领域取得了辉煌璀璨的成果, 其中以江南学者的成果最为突出。清代江南学者取得最大成就的是朴学领域, 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等, 而从事朴学研究, 需要大量的图书资料, 但中国古代公家藏书一直不发达, 所以清代江南学者在治学时主要依靠私家藏书。可以这么说, 江南地区朴学的昌盛, 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兴旺。江南作为清代学术最为发达的地区, 同时也是私家藏书最为兴盛的地区。江南地区的顾炎武、钱大昕、戴震、惠栋、章学诚、俞樾、孙诒让等均系大师级的超一流学者, 在清代学术史上叱咤风云, 成就卓著。与此相应, 清代江南地区的藏书家人数众多。据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一书统计, 清代江苏有藏书家 290 人 (绝大多数在苏南), 浙江有 267 人, 其中包括许多海内闻名的藏书大家, 而藏书质量更是其它地区无与伦比的。另据范凤书统计, 中国藏书家最多的 10 个市县依次是苏州、杭州、常熟、宁波、湖州、绍兴、福州、嘉兴、海宁、南京。除了离江南地区较近的福州之外, 其余 9 个市县全部在江南地区同时也是全国文化学术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同一个省内, 学术发展促进私家藏书兴盛的情况也十分明显。以浙江为例, 在清代, 该省学术文化事业最为发达的当数杭州、宁波、绍兴、嘉兴和湖州, 这些地区的私家藏书也远较浙江其它地区兴旺。上述现象绝非偶然的巧合, 而是有着必然的联系。

清代江南学者大多本身拥有较多的藏书, 主要是靠自己的藏书做学问, 同时也利用他人的藏书。浙江秀水 (今嘉兴) 的朱彝尊乃清初著名学者, 曾参修《明史》, 著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等, 并编纂了《明诗综》和《词综》, 堪称著作等身。由于学术研究的需要, 朱氏购买和抄录了大量书籍。他在京参修《明史》期间, 经常从史馆借抄, 并借抄于无锡秦氏、昆山徐氏、钱塘

收稿日期: 2003-05-08

作者简介: 陈东辉 (1966—), 男,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和清代学术文化史研究。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参见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总论与专论十一《中国藏书家的区域分布》, 大象出版社 2001 年版。

龚氏、宁波范氏等明末清初的藏书世家，历年所抄达 3 万余卷，占其全部藏书的近 40%。朱彝尊家有藏书三十椋，近 8 万卷，在其老家秀水梅会里建有著名的藏书楼“曝书亭”。为了搜求典籍，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丰富的藏书，为朱氏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朱氏的重要著作《经义考》，乃规模宏大的专科版本目录学著作，取材宏富，辨订群书，识断通核，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重要工具书。试想如果没有“曝书亭”的大量藏书作基础，是难以写成《经义考》的。又如清代中期的陈鱣系浙江海宁人，精于经学及文字学、训诂学，著有《经籍跋文》、《石经说》、《两汉金石记》、《埤苍拾存》、《声类拾存》、《恒言广证》、《续唐书》、《松砚斋随笔》、《简庄文钞》、《简庄文钞续编》、《简庄缀文》、《简庄疏记》和《简庄诗钞》等。阮元称其“于经史百家靡不综览”、“浙西诸生中经学最深者也”。与当时的著名学者钱大昕、王念孙、翁方纲、段玉裁等交往颇多，他们都敬重陈鱣的学问。为了从事经学等的研究，陈鱣一生中收藏图书达 10 余万卷，其在海宁的藏书楼名为“向山阁”，与黄丕烈士礼居、吴騄拜经楼齐名。陈氏藏书的特色与其学术旨趣紧密相关。他对经学研究颇深，其藏书亦多宋元刊经部珍本，内中不少系用重金收购而得。据清代浙江海盐藏书家钱泰吉在《曝书杂记》中的记载，陈鱣藏有宋刻《周易注疏》、《周易本义》、《尚书孔传》、《尚书集传》、《毛诗传笺》、《周礼注》、《礼记注》、《礼记注疏》、《尔雅单疏》、《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等。陈鱣还利用收藏经书众多的有利条件，对有关经书进行了校勘，最后汇成《经籍跋文》19 篇，学术价值甚高。

再如浙江瑞安的孙诒让堪称晚清大学者，一生博览群籍，锐意治学，著述宏富。他在经学、训诂学、校勘学、文字学、甲骨学、金石学、文献学、目录学、诸子学等领域均卓有成就，给后人留下了《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礼运》、《籀庀述林》、《古籀拾遗》、《名原》、《契文举例》、《温州经籍志》等多种著作。孙诒让的学术成就，是与他和他的父亲孙衣言所创建的著名藏书楼——“玉海楼”分不开的。玉海楼曾有藏书八、九万卷，除了一般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外，还度藏了大量浙江地方文献，其中温州地区历代学者的著述即有 460 多种，内有明刊本 32 种、明钞本 2 种、钞本 210 种、稿本 10 种、传钞稿本 1 种、日本刊本 1 种。这些典籍大多经过有关学者的批校，价值颇高。上述藏书，为孙诒让撰写《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甃记》、《温州建置沿革考》、《瑞安建置沿革考》、《永嘉郡记集本》及孙氏父子编刻《永嘉丛书》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孙诒让还对玉海楼中的许多藏书进行了批校和考释。如他的名著《礼运》，即为校释 78 种古籍的学术笔记，计有校文 1300 余条。他对黄以周《礼书通故》的批校多达 300 余条。

上文论述了清代江南地区学术发展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兴盛。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私家藏书之兴盛，反过来又促进了清代江南地区学术尤其是朴学的发展。首先，私家藏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图书。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大量的私家藏书的支撑，清代江南地区学术尤其是朴学研究要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蔡尚思在论及藏书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时云：“藏书的风气大盛，如钮氏世学楼、祁氏淡生堂、黄氏千顷堂、钱氏绛云楼、郑氏丛桂堂、徐氏传是楼，尤其是范尧卿的天一阁，藏书甚富；毛子晋父子的汲古阁，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没有明末这批私人大图书馆，清初黄宗羲等人能博览群书，广搜史料吗？”事实确实如此。许多学者虽有自己的藏书，但一个人的家藏毕竟有限，一般还是需要利用他人的藏书。蔡氏提及的黄宗羲，家中虽有祖辈留下的许多图书，但他仍感不足，多次外出访书。钱谦益的绛云楼在明末清初的江苏私家藏书中首屈一指。清顺治七年（1650），黄宗羲赴绛云楼借书，钱谦益破例允其观书。黄氏看了钱氏丰富的藏书后，有云：“得翻其书籍，凡余之欲见者，无不在焉！”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的钱大昕乃清代数一数二的朴学大师，著述宏富。与一些著名藏书家相比，钱氏的藏书并不算十分丰富，但他在治学过程中，曾多次向黄丕烈、袁廷椿、卢文弨、周锡

《定香亭笔谈》。

参见《曝书杂记》卷上。

《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增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

璚、顾之逵、戈宙襄、严元照、何元锡、刘桐、吴騫等人借抄图书，遂使他的学术著作益发博大精深。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某些善本钱大昕未曾寓目，从而使他的个别考证的精确性稍受影响。如傅增湘在为《校史随笔》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窃惟史籍浩繁，号为难治。近代鸿著，无如王氏《商榷》、钱氏《考异》、赵氏《札记》。三君皆当代硕儒，竭毕生之力以成此书。其考辨精深，征引翔实，足为读史之津寄。然于疑、误、夺、失之处，或取证本书，或旁稽他籍，咸能推断，以识其乖违，终难奋笔以显为刊正，则以未获多见旧本，无所取证也。第旧本难致，自昔已然。钱氏晓征博极群书，然观其《旧唐书考异》，言关内道地理于今本多所致疑，似于闻人诂本未全寓目。明刻如此，遑论宋、元。”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纠正了正史刊本中的诸多讹误，水平甚高。然而由于他们未能见到更多的宋元善本，致使个别考证失误。同时，钱、王凭借个人学识指出的《五代史记》时本中的某些错误，在张元济所见之宋庆元刊本中不误，并且尚有不少未及指出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钱、王的上述考订变成了无效劳动。如果他们当时能见到较多的宋元善本，那么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了，《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的质量也将更高。这一事例，从反面说明了私家藏书对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

另外，有些江南学者因条件所限，本身藏书较少，在研究时主要借助他人藏书。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虽然在建阁之初就确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制度，对登阁观书也限制得很严，但是仍有一些江南学者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钱大昕等，获得特许而有幸登阁观书。其中黄、万、全三人系浙东学派之大师，可见天一阁对浙东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清初徐乾学（江苏昆山人）的传是楼藏书甚富，万斯同《传是楼藏书歌》赞曰：“玉峰当代盛人物，君家昆弟真英豪。论才宇内原无双，积书囊内亦第一。”康熙年间徐乾学设局纂辑《大清一统志》，延聘阎若璩、胡渭、顾祖禹、黄仪、姜震英、查慎行、黄虞稷等著名学者分纂。胡渭借此机会充分利用传是楼的丰富藏书，“纵观天下郡国之书，凡与《禹贡》山川疆域相涉者，随手钞集，与经文比次，以酈道元《水经注》疏其下，酈注所阙，凡古今载籍之言，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最终完成了《禹贡锥指》这一清代学术史上的名著。诚如梁启超所云：“这部书虽然有许多错处，但精勤搜讨，开后来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价值当然也不可磨灭。”顾祖禹的传世名著《读史方輿记要》，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是楼的众多藏书。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一些藏书家较早地意识到不秘私藏、互相交流的重要性。清初藏书家曹溶（浙江秀水人）在《流通古书约》中，曾明确指出藏书家最重要的社会职责在于流通阅读，而不仅仅是收藏保管，务使历代珍贵典籍，不以深锁秘藏而与世隔绝。

清代江南藏书家大多具有渊博的学识，不少人乃是有影响的一代大师。他们利用丰富的藏书，积极从事目录、版本、经学、小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的研究，以及校勘、辨伪、辑佚、编纂、刊刻等方面的学术活动，为清代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黄丕烈（江苏吴县人）之“士礼居”、“百宋一廬”的藏书堪称乾嘉时期藏书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藏书史上罕见的突出典范。《清朝野史大观》云：“前清二百七十年间，南北收藏家，其于古书面目，版本源流，深知笃嗜者，颇不乏人，必以堯圃为巨擘。”近人陈登原云：“乾嘉间之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廬之时代允矣。”黄丕烈毕生致力于古籍的收藏和整理研究，在藏书活动的各个方面均成绩卓著，同时在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等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共批校了700多种古籍并撰写了题跋。这些题跋说明该书的来龙去脉，介绍作者的情况，区别刻本的优劣，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都很高，影响颇大。古旧书行业

参见《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一。

张元济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参见《校史随笔》中“金史·考异所指有误”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参见《校史随笔》中“五代史记·钱大昕考异所指此不误”条、“五代史记·王鸣盛商榷所指此不误”条和“五代史记·时本讹夺多可纠正”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转引自《藏书纪事诗（附补正）》卷四《徐乾学健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四十《胡东樵先生墓志铭》。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古今典籍聚散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一直流传有“顾批黄跋”的说法。凡是一部由黄丕烈写题跋、作校勘的书，就身价倍增。《菟圃藏书题识》、《菟圃藏书题识续录》和《菟圃藏书题识再续录》，收录黄氏题跋共计 800 余篇，成为后人研究古典文献学和清代学术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清代江南藏书家在目录学、版本学领域成绩卓著。钱谦益的《绉云楼书目》，钱曾的《也是园书目》、《述古堂藏书目》、《读书敏求记》，孙星衍的《平津馆鉴藏书籍记》，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菟圃藏书题识》、《百宋一廛书录》，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本书目》，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丁丙的《八千卷楼书目》、《善本书室藏书志》，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等，均为高质量的书目题跋之作，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的《读书敏求记》由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所撰，收录钱氏藏书中精华部分 634 种，专记宋元精刻。该书开创了藏书题跋记形式的目录新体裁，同时还开拓了目录学中版本研究的新领域，为版本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钱氏在书中总结出了图书版本鉴定方法上的不少规律，其中主要是以版刻、字体、纸墨、校补状况以及内容等为依据，考定图书雕版刷印的年代及版本优劣，为后人研究版本提供了宝贵经验。清代中叶以后，受该书之影响，版本目录学逐渐发展成为显学，产生了大量的善本书目和题跋记等著作。此外，钱氏对该书所著录图书的评价与考辨，都援引了比较丰富的资料，颇为学者所重。清代学者阮福重刻该书时尝谓：“遵王此书述著作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留心搜讨不遗余力，于目录书中洵为佳著。”评论堪称允当。

由此可见，清代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关系密切。清代学术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同时也是私家藏书最为兴盛的地区。相反，清代学术不发达的地区，私家藏书也较少。从总体而言，清代北方地区的学术发展明显不如南方地区，与之相应，北方地区的私家藏书也明显不如南方地区多。藏书不足，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北方学者的视野，对学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桂馥曾云：“北方学者，目不见书，又鲜师承，是以无成功。”桂馥所言，固然有些偏颇，并不全面，但也不无道理。这一情况，也可以从反面说明清代江南地区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江南地区内部而言，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如清代浙江西南部的处州（今丽水）、严州（今建德、淳安、桐庐）和衢州等地的学术发展水平，远远不如浙江东北部的宁绍地区和杭嘉湖地区，其私家藏书的数量同样差距甚大，学术研究昌盛与私家藏书兴旺之互动关系十分明显。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osperou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Flourishing of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the Jiangnan Area in Qing Dynasty

CHEN Dong-hui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 This thesis discusses systematically and completely the relations of help each other forward, cause and effect each other between prosperou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flourishing of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the Jiangnan area in Qing Dynasty. In the first half part, the author talks the prosperous of learning especially Puxue (朴学) in the Jiangnan area in Qing Dynasty, bring about advance for flourishing of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to a great extent. In the second half part, the author talks the flourishing of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at once bring about advance for prosperous of learning, especially Puxue (朴学) in the Jiangnan area in Qing Dynasty conversely.

Keywords: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 Learning of Qing Dynasty ; Jiangnan Area

清道光五年（1825）小琅嬛仙馆《读书敏求记》刻本序。
《晚学集》卷七《周先生传》。